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 政治传播与健康传播的关系略论

赵洁 荆学民

摘要: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健康传播的公共属性被最大化地激发,从而与政治传播发生绞合。二者的绞合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出两种样态。一是相互借力,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这包括政治传播对健康传播权威性的加持和渠道的拓展;也指健康传播为政治传播提供传播素材,并以其专业性助力政治传播。二是单向掣肘,影响各自效能的发挥。包括政治传播挤压健康传播空间,传递错误的健康信息;健康传播扰乱政治传播的正常秩序等。从根源上来说,行政组织中政治传播所遵循的“行政逻辑”和面向社会的政治传播所遵循的“宣传逻辑”,是决定二者绞合样态的关键因素。因此,只有克服这两种传播逻辑的痼疾,使政治传播和健康传播在理念上实现有机衔接,都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同时辅以优良的制度,并不断提升政府和民众政治传播和健康传播的能力和素养时,二者才能真正实现长期而持续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政治传播;健康传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1)03-0034-08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7AXW010);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2019年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突然暴发并快速全球大流行,给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毫无疑问,这次空前的疫情防治也是对各国国家治理的一次大考。在各国政府对这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其衍生危机的应对中,除医学这一核心武器外,信息传播也是进行有效预警和防控的重要环节。其中,政治传播和健康传播是这一环节重要的两翼。实践证明,只有实现二者的良性配合与互动才能最大化地激发传播效能,为科学有效地应对危机助力,保证社会安定有序发展。在既有研究中,对危机传播、危机状态下的政治传播以及健康传播的研究成果都已经有很多,但从政治传播的视角,关注危机状态中政治传播与健康传播关系的研究还见之甚少。本文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传播与健康传播的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公共属性是政治传播与健康传播绞合的前提条件

健康传播指的是医疗保健过程中人们的互动关系以及对于健康相关信息的说明与宣传。^[1]健康传播在最初受到学界关注的时候,主要指在医疗场景中病人和医生之间的人际交流,后来逐渐拓展至借由大众媒介展开的健康知识和信息的普及活动。至今,健康传播的内涵更加广泛,主要指传播在医疗保健服务和健康促进中的角色与功能,包括人际、组织和大众等多层面的传播实践。其中,健康信息作为健康传播的主要内容,既包括从与患者访谈和实验室测试中收集的用于诊断健康问题的知识;也包括在体检中收集的用于评估卫生保健治疗效果的数据;还包括对突发健康风险的警告信

号等等。^[2]由此可见,健康传播具有专业属性和公共属性^①两大特性,囊括个人和社会两大面向。其中,专业性强调的是健康传播有赖于医务人员和营养学家的专业判断和指导,这一特性决定了其自主的地位和逻辑,是健康传播区别于其他传播的特质;与之相应,公共性强调的则是健康知识和信息与每一个社会人都息息相关,还可能会影响到国家与社会的稳定发展,这一特性是健康传播社会面向的体现。

政治传播是指“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信息的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是政治共同体内与政治共同体间的政治信息的流动过程”。其中,“政治信息”是从“政治”中解构出来的本质因素,即这种信息只能是“政治”的。^[3]而政治在本质上是一种对共同体事务进行引导和管理的公共活动^[4],具有强烈的公共性色彩,这决定了公共性是政治信息的本质属性之一。“扩散”和“接受”是从“传播”中解构出来的本质要素,即政治信息是在“扩散”和“接受”的状态中^[3],而并非是“私密”和“保守”的,这意味着政治信息公共性的凸显。因此,政治传播作为政治信息的流通过程,本质上也是一种公共活动,其主体、内容、过程和效果也都承载着公共属性。

综合国际和国内标准^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暴发的突然性、生命安全的直接相关性、传播的广泛性、结果的危害性和治理的综合性等特质。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特殊情境下,原本单纯属于健康卫生领域的问题可能会演化为一个涉及卫生健康、国家治理、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综合性问题,对国家乃至全球政治和经济产生深刻影响。从学理上讲,这意味着健康传播的公共属性将会被最大化地激发,与疫情相关的健康信息具备了稳定和团结民心、塑造政府形象以及彰显国家能力的重要作用,从而与政治传播发生密切绞合。

二、政治传播与健康传播绞合的现实样态

目前,全球正处在史上新病种出现速度、疾病传播速度最快的时期^[5],世界各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自《国际卫生条例(2005)》生效以来,仅由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的“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就有6次。在我国,近些年来也接连暴发过影响巨大的非典型肺炎、甲型H1N1流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疫情。在这些由突发性疾病引发的黑天鹅事件中,不仅政治传播与健康传播密切地绞合在一起,即各国政府始终处于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核心地位,需要与医疗卫生机构和媒体相互协作,共同展开疫情信息通报、科普教育活动,从而化解危机,保证公民的生命健康安全;而且这种绞合还呈现出多种多样的样态,展现出不同的效能,既有政治传播与健康传播相互助力而达致良好传播效果的情况,也不乏因为一方的单向掣肘而导致信息传播失控的情形。

(一) 政治传播与健康传播相互借力

在一些国家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传播与健康传播不仅能够较好地完成各自的传播目标,还可以借助自身的内在优势和固有力量助力于对方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溢出效应。

首先,就政治传播对健康传播的助力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政治传播可以使健康传播获得权威性和可信性的加持。根据霍夫兰对于传播效果的探究,传播者的信誉和专业特性构成了可信性的基础。^[6]在自上而下的政治传播中,由于传播主体多是政府或者政党,因而传播具有较高的可信性和权威性,这一特质也助推了健康传播的顺利展开。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发初期,政府若能够及时通过政府新闻发布和发言人制度或者借助官方媒体,以政治传播的形式对疫情信息向

^①本文中的公共属性并非阿伦特、哈贝马斯等学者在公共领域下探讨的具有规范意义的“公共性”,而是在有关公众而非个人、公开而非私密、公务而非私情的内涵下运用这一概念,即强调健康传播和政治传播的公共面向。

^②《国际卫生条例(2005)》规定“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1)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构成对其他国家的公共卫生危害;(2)以及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的事件”;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规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

国内和国际社会进行具有权威性和一致性的通报说明,那么就可以及时、有效地发挥疾病预警、健康知识科普和疫情谣言管控的作用。由此,二者都能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第二,政治传播能够使健康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宽或增加。除上述提到的健康传播可以通过官方网站和主流媒体进行自上而下的传播外,这一点还尤其体现在自下而上的健康传播中。由于一些国家尚未具备制度化和专门化的健康传播通道,因此地方的疫情信息在向中央传播过程中便会受到阻碍。此时,便可借助政治传播的通道,及时、快速地将疫情信息传达至最高决策部门,助力于防疫工作的部署安排。

2005年,禽流感疫情开始在全球迅速蔓延,在中国应对禽流感的情境中,政治传播和健康传播都达到了较好的传播效果,这很大程度上源自政治传播对健康传播的助力。当地方发现疑似病例后,便立即向卫生部门报告。卫生部门实时组织防疫人员展开系列工作的同时,中央决策部门也及时做出全面的工作部署,这均有效抑制疫情的进一步蔓延。

继而,在确定两例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 H5N1 病例后,卫生部作为传播主体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了官方消息,并且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港澳台地区和部分国家进行报告,提供人感染禽流感病例相关的病毒信息。^[7-8]并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也及时就禽流感防控情况多次举行新闻发布会,卫生部、农业部相关官员通报疫情及防控情况,并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9-10]此外,卫生部、农业部还积极运用官方媒体展开禽流感相关知识的科普活动,宣传预防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和食品安全知识。纵观以上传播活动,其行为主体主要是政府机构或者官方媒体,这样就提升了健康传播的权威性:不仅能够向民众科普健康知识,避免谣言的滋生,使民众提高防范意识;还能够加强政府与民众之间关于抗疫信息的直接沟通,建立起国家-社会协作抗疫机制,这对于健康传播无疑是大有助益的。

其次,就健康传播对政治传播的助力而言,也具有两方面的体现:其一,健康和疫情信息为政治传播提供了更多可资利用的生活气息浓郁的传播素材。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互联网技术的发达,政治不再是宏阔辽远的事情,而开始与每一个公民都息息相关,与民众日常生活更加契合,以用户为中心、碎片化的传播内容与方式也成为各国政治传播的新趋向。而疫情信息、健康知识或者是疫情中发生的动人故事就是发生在民众身边,充满情感和温度,并能够使人感同身受的一类信息。当政治传播以此信息作为传播内容,并将其置于爱国叙事或者责任叙事中进行表达,其传播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便可大大增强。例如,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就运用责任框架,将这次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定性为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和“人民战役”,凸显了党和国家对于人民的责任意识。显然,这类传播不仅可以彰显党和政府对于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关怀与重视,也能够使政治传播的话语和内容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激发民众勠力同心、共抗疫情的坚强意识。其二,健康传播所具有的专业特性还可以助力于增加政府公信力,塑造专业而有温情的政府形象。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当医务人员同时作为政治传播主体出现时,他们本身所具有的技术专业性和人文关怀性便会加诸政治传播的过程中,以其专业、权威的知识重塑民众信心,凝聚民众力量,引导公众舆论。同样,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钟南山、张文宏和李兰娟等专业医务人员不仅是健康传播的权威主体,同时也扮演着政治传播舆论领袖的角色。一方面,他们就新冠疫情的传染特点、发展态势以及预防手段等不断做出预判,从而有效引导舆论,稳定民心;另一方面,他们不畏病毒,始终坚守在第一线的大无畏精神,以及负责任、有温情和说真话的形象有效提升了政府公信力,使民众更加认可和支持政府的抗疫措施。

(二) 政治传播与健康传播单向掣肘

在现实生活中,政治传播和健康传播相互借力的样态固然是好,但是单向掣肘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即二者的绞合既可能会影响彼此的传播效果,自身的传播目的也不能保证可以如期实现,这一现象同样需要被关注。

首先,就政治传播对健康传播的掣肘而言,政治传播可能会损害其专业性和自主性。这种影响

包括积极和消极两种方式。就积极方式而言,政治传播或是基于自身政治目的,利用本身所具有的权威性主动传递错误的健康信息,从而阻碍科学的健康传播的展开;或是将健康问题政治化,在政治性的议题框架中来阐释健康问题,从而抢占健康话语空间,争夺民众的注意力,导致健康信息传播的延误。就消极方式而言,政治传播可以以信息监管为由,对不符合其传播目的的健康信息进行管制,封锁健康信息的传播渠道,使健康传播无法正常地展开。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拥有成熟的医疗体系、先进的医疗设备和专业的医疗护理人员。但是,在此次新冠疫情大流行中,美国在控制疫情方面举步维艰,累计数以千万计的确诊病例以及不断增加的死亡人数令人匪夷所思。究其原因,政治传播对健康传播的裹挟是其中关键因素之一,上述三类情况在美国均有发生。一是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基于自身的政治考量以及美国的经济等因素^[11],无视科学卫生知识,经常以总统的身份传播与健康专家南辕北辙的信息,打乱健康传播的正常节奏,影响民众对于疫情的判断。二是有关疫情的信息常常被转移到政治议题上去,使舆论场围绕政治议题而非健康议题展开交锋,从而挤压当时亟待传播的健康话语的传播空间,转移民众对于疫情的关注。譬如,2020年3月以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一旦提及新冠肺炎疫情,就刻意指着中国。他们曾在多个场合将新冠病毒称之为“武汉病毒”“中国病毒”,将传播重点置于政治交锋上而忽视了对更为重要的疫情信息的传播。三是运用信息管控等手段阻碍健康传播。Science杂志主编 Holden Thorp 曾经提到美国存在“当科学家试图分享这一流行病的有关事实时,政府要么封锁这些信息,要么以矛盾的形式加以重申”^[12]这一现象,并呼吁总统要尊重科学。

其次,就健康传播对政治传播的阻碍而言,主要表现在健康传播对正常的政治传播秩序的扰乱。这一现象常常发生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发前期。由于疫情暴发的突然性和后果的危害性,公众往往会形成恐慌无措、茫然不安的心理,亟需寻求相关信息来满足内心对于确定性的渴望,因而特别容易轻信所获得的各类信息。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各类未经权威确认的健康信息就开始广泛传播,滋生出各种各样关于疫情的谣言,进而引发社会恐慌,削减政府信任,扰乱正常政治传播的秩序。例如,在SARS疫情暴发前期,各类关于SARS的外行知识通过种种非正式渠道得以迅速传播^[13],虽然这些外行知识并非是都错误的,但是确有一些信息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如引起板蓝根、白醋和食言等物品的抢购风潮等^[14]。事实上,不止在SARS疫情期间,在各类突发公共事件中都可能会出现各类健康谣言。再如,21世纪初,尼日利亚北部出现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可能导致儿童不育这一缺乏事实根据的传言,这最终导致脊髓灰质炎在尼日利亚的再次流行^[5],从而接连导致了民众对于尼日利亚政府所发布对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举措的不信任和不配合^[15]。

总而言之,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传播与健康传播必然是密切绞合在一起的。二者或者是相互借力,在完成各自传播任务的情况下,还能助力对方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或者是相互龃龉,阻碍对方的传播,影响彼此效能的发挥。而只有二者相互借力,实现良性互动的时候,才能真正激发政治传播和健康传播的正面效能,从而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三、影响政治传播与健康传播绞合样态的关键因素

从上述情形来看,一旦政治传播与健康传播发生绞合,更加主动和强势的是政治传播,而健康传播稍显弱势,处于被动配合和回应的地位。在政治传播助力健康传播维度,只有当政治传播能够在尊重健康传播的基础上,及时、有效地传播科学的健康信息时,健康传播才得以顺利进行。反之,政治传播对健康传播的过度干预与利用,或者政治传播的缺位失能都可能会导致不良影响的产生。而在健康传播助力政治传播维度,其效果也取决于政治传播对健康传播适当运用或管理。总结规律,决定二者绞合样态的关键在于政治传播,而政治传播的运行往往遵循“行政逻辑”和“宣传逻辑”两大逻辑。

(一)“行政逻辑”对于政治传播和健康传播绞合的影响

政治传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政府机构之间的信息传播。这一类的政治传播活动依赖政府组织展开。政府组织和行政管理体系是政治权力依据职能划分的客观载体。虽然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寻求行政管理体系改革,但以科层制为基础的行政管理体系仍然被运用至世界大多数国家之中。这一管理体系是一种基于职责和权力的层级划分和命令-控制模式。上级掌握着决策权和监督权,下级主要负责执行,上下级之间依据既有规则予以配合,具有制度化、专业分工等优点,但也可能存在效率低下、形式主义和利益短视等问题。而依凭政府组织展开的政治传播便会受到行政管理体系的固有特征的影响。

在客观上,行政组织是层级化和部门化的,除具有跨层级、跨部门传播的制度规定外,多数信息都需要经过层层传递与接收才可以最终到达决策部门。因此,这一过程中不排除信息会遭到遗漏、扭曲或丢失。在主观上,长期以来,如果缺少必要的变革和监督,那么科层组织体系中的“对于规则的服从”久而久之会“从手段变成目的本身”,“纪律被解释为照章办事”,这种本末倒置的认知往往会形成惰政,逐渐发展为“思想僵化和工作死板”。^[16]这种“胆怯、保守和技术主义的工作作风”^[16]并不适用于突发事件中的信息传递情形。此外,行政组织体系中的工作人员还会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承担的责任,不断地衡量与算计政治利益,并以此为基础对信息进行选择性传播。以上便是政治传播所需遵循的“行政逻辑”。因此,当一国缺乏独立化和专业化的健康传播渠道,需要借助政治传播渠道来传递疫情信息时,那么政府组织运行过程中的“行政逻辑”便会开始发挥或好或坏的作用。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发初期,最迫切的事情即为由地方至中央迅速而准确地传递消息,以供决策部门及时向社会预警,并做出部署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已经明确制定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信息传播的相关法律或制度规定,或者在行政管理体系中提前设置有专门化的健康传播通道;那么照章行事、按部就班的行政逻辑就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助力于健康信息及时、全面地传递给决策部门或者向社会展开预警。反之,如果一国尚未制定有相关信息传播的制度,或者在行政管理体系中没有设立专门化的健康传播通道,那么,层级化和部门化的组织体系,以及行政官员对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便可能成为健康传播的阻碍,淡化、扭曲甚至延误疫情信息的传播。

总之,政治传播所遵循的“行政逻辑”是影响政治传播和健康传播绞合的关键逻辑之一,这种影响既可能是正面的——会为健康传播开辟传播渠道,提供制度便利;也不乏负面的——阻碍健康传播的顺利进行。其中,重要的是利用好“行政逻辑”对于制度的强调和遵循。

(二)“宣传逻辑”对于政治传播和健康传播绞合的影响

除了上述凭借政治组织展开的政治传播活动外,在政府、媒体和公众之间的政治信息的流通也是政治传播的重要维度之一。在这一维度,政府和政党是最主要的传播主体,他们的传播行为天然地以政治取向为主导,旨在构建政府合法性、塑造政府形象以及增强政治信任等。那么,传播主体借助各类传播渠道、素材以及技巧来建构社会感知、控制社会意识、指导社会行为这一逻辑,即为政治传播遵循的“宣传逻辑”。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会产生很多直击内心、令人动容的故事,例如医护人员、基层工作者等舍小家为大家、始终在抗疫第一线的坚守,陌生人之间的爱心捐助,病人的乐观治疗等等。这为展开政治传播营造了特殊的传播场景,提供了很多可以凝聚人心、激发共鸣、塑造价值观念的情感素材。因此,在宣传逻辑的指引下,政治传播倾向于利用这些健康信息,来制造感动和共鸣以达到汇聚人心、增进共识、提升政府公信力等传播目的。这一行为本身无可厚非,还可以使政治传播与健康传播达成一致互助的效果。不过一旦突破基于事实、忠于事实这一底线,为了政治目的而不惜哗众取宠、夸张猎奇,政治传播就有可能走向政治作秀的极端,健康传播也会受到压制。长期来看,这不仅不利于基于科学和良善的健康传播的展开,也会损害政治传播的品质。此外,除上述可能外,在宣传逻辑的主

导下,获取最大的政治利益而非最佳的社会效果、关注眼前的利益而非长远的影响,常常成为传播行为的出发点。因此,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发,官员们常常会因为利益短视行为而对疫情信息采取掩盖或者淡化处理。由此,当政治传播缺位,各种各样的健康谣言就会滋生,从而扰乱正常的健康传播秩序,引发社会恐慌心理,而这又会影响政治传播的正常展开。如此周而复始,产生恶性循环。

总之,政治传播所遵循的“宣传逻辑”是另一个影响二者绞合样态的内在原因,与“行政逻辑”相同,它对于二者的绞合样态也具有双面性的影响,其重点则在于对传播价值理念的统一。

综上所述,政治传播活动所需遵循的“行政逻辑”和“宣传逻辑”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会对健康传播产生或促进或阻碍的影响,是决定二者绞合样态的内在因素。因此,要实现二者互动,重要的就是从这两大逻辑入手,克服存在的弊端,发挥其中的优势。

四、实现政治传播和健康传播的良性互动

究其实质,无论是行政逻辑还是宣传逻辑,其都涉及传播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规范两大问题。其中,行政逻辑关涉更多传播的制度架构的问题,而宣传逻辑则与价值理念关系更为密切。因此,要实现政治传播和健康传播的良性互动,就首先要从价值和制度两大维度着手,克服行政逻辑和宣传逻辑中的内在痼疾,发掘行政逻辑和宣传逻辑中所蕴藏的优势。

其一,政治传播要始终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传播价值理念,从而实现政治传播与健康传播在理念上的有机衔接。从健康传播来看,其最初源于医护人员与病人之间的交流,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最佳的治疗方法;后来含义有所扩展,但初衷都是为了分享健康信息,培养健康行为和促进人类健康。因此,健康传播的根本价值追求就是为了维护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等基本权益,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文明和人类持续发展。而从政治传播来看,它内在包含政治、传播和资本三大要素,“在合理的政治传播机制与形态中,政治当有正义的追求,传播当有公正的使命,资本当有正当的边界,政治传播在强化理性深思、传播真实信息和维护人类正义的轨道上运行”。^[17]显然,理想中的政治传播与健康传播的初衷是一致的,都旨在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社会文明发展。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政治传播中的三种要素都有偏离各自轨道、发生利益冲突的可能,无法形成理想中均衡而良性的状态。这导致现实中的政治传播实践可能会过于专注某一要素主导下的短期目的,如建立政治认同、获取经济利益,而违背最初的价值理念。正如上述所讨论的宣传逻辑下的政治传播一样,其专注更多的就是建构政治合法性、塑造政府形象这一维度。因此,要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首先要使政治传播与健康传播在价值理念上衔接起来,即政治传播要始终秉承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为最终价值取向,并在此指导下展开具体的政治传播实践。

进一步言之,政治传播的正义取决于政治的正义。就此而言,无论何种政治制度,都应始终将民众的生命和利益置于第一位,积极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民众造成的生命和财产威胁。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就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维护人民利益、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尤其是自党的十九大以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党和国家就始终将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的利益,将人民的生命和健康置于第一位,并在此理念的指引下努力将疫情损失降至最低,有效防控疫情的大范围扩散。总之,要实现政治传播和健康传播的良性互动,首先必须坚守人民至上的政治价值理念。

其二,政治传播要优化体系结构,实现与健康传播在制度上的合理互补。实现政治传播与健康传播在理念上的衔接是软性要求,必须要配以硬性的制度设计进行保障。首先,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无论是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都需要中央-地方、国家-社会、决策部门-执行部门之间的密切配合,而配合的前提与基础则是疫情相关信息的全面、迅速传递。因此,可以在政治传播通道之外开辟或者扩容专业化的健康传播通道,打造疫情信息传播的双重通道,营造多元化的传播环境。

这样,既可以保证健康话语的专业性不被侵蚀,也可以为决策部门提供较为全面的信息。其次,鉴于行政管理体制的制度化特性,还应建立关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报告与发布的法律规范及实施细则,使政治传播和健康传播凭借行政组织展开的时候能够具有程式化的行为模式,不至于因为层级多或者官员工作死板而遭到延误。再次,除多元化的传播渠道和制度化的传播方式外,还应该建立专业化的第三方监督机构,引入社会的力量或者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力量以监督政治信息和健康信息的传播过程,避免或减少信息披露不及时、信息传递不全面等现象的发生。并且,第三方监督机构所获得的信息也可以作为政治传播和健康传播绞合状态的反馈之一,帮助二者不断调整与规范。最后,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云技术,人工智能等开始广泛运用至政府管理中。因此,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有效利用新兴的传播技术,对疫情信息进行实时监测和搜集,同时注重开放和共享相关数据信息,以供专业医药科研机构或者相关社会组织运用,都有利于政治传播和健康传播的良性互动。

其三,在政治传播与健康传播实现政治价值统一、法律制度完善之后,还应推动在常态下的政治传播和健康传播互动实践。一方面,常态下的健康传播的公共性虽然不如危机状态下突出,但是健康传播活动的展开同样可以向民众普及健康知识和技能,提升民众的健康素养,增强其风险预警意识,如此便可未雨绸缪,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科学的健康传播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一国政治传播活动常态化和制度化也能够不断提升政府信息公开、数据开放以及与民众互动的能力。这些都有利于在政治传播与健康传播发生绞合时,促进二者向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

综上,只有当政治传播和健康传播在理念上实现有机衔接,都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辅以优良的制度,并不断提升政府和民众政治传播和健康传播的能力和素养时,二者才能真正实现长期而持续的良性互动。通过这种良性互动,双方既能够在保持独立的基础上较好地发挥各自功能,提升自身运行品质;同时也能助力国家科学、高效地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其衍生危机,维护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

参考文献:

- [1] 盖斯特-马丁. 健康传播: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影印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导读页.
- [2] G. L. Kreps, E. W. Bonaguro, J. L. Query Jr.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L. D. Jackson, B. K. Duffy.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Guide to Developments and Directions,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98: 1-15.
- [3] 荆学民. 政治传播活动论.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26.
- [4] 海伍德. 政治学核心概念. 吴勇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40.
- [5] 世界卫生组织. 构建安全未来.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X;21.
- [6] 卡尔·霍夫兰,贾尼斯,凯利. 传播与劝服:关于态度转变的心理学研究. 张建中,李雪晴,曾苑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28.
- [7]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卫生部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我国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情况. 2005-11-17. [2020-12-21] http://www.chinacdc.cn/zxdt/200511/t20051117_31018.html.
- [8]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国首次向世卫组织提供人禽流感病例毒株. 2005-12-21. [2020-12-21] http://www.chinacdc.cn/zxdt/200512/t20051221_31050.html.
- [9] 中国政府门户网站. 新闻办举行艾滋病、禽流感问题新闻发布会. 2005-11-30. [2020-12-21] http://www.gov.cn/jrzq/2005-11/30/content_113238.htm.
- [10] 中国政府门户网站. 新闻办就中国内地禽流感防控工作举行新闻发布会. 2005-12-14. [2020-12-21] http://www.gov.cn/xwfb/2005-12/14/content_126838.htm.
- [11] F. Fukuyama. The Thing That Determines a Country's Resistance to the Coronavirus. Atlantic, 2020-3-30. [2020-12-21]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03/thing-determines-how-well-countries-respond-coronavirus/609025/>.
- [12] H. H. Thorp. Do Us a Favor. Science, 2020, 367(6483): 1169.

- [13] 马健. 危机事件中的科学传播——基于“SARS”与“禽流感”疫情的研究. 科学学研究, 2008, 3: 488.
- [14] 非典百日实录. 南方都市报, 2003-05-21. [2020-12-21] <http://news.sina.com.cn/c/2003-05-21/17501082777.shtml>.
- [15] C. C. Ezeibe, C. Ilo, E. N. Ezeibe, et al. Political Distrust and the Spread of COVID-19 in Nigeria. *Global Public Health*, 2020, 1-14.
- [16] 默顿.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 唐少杰, 齐心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8: 301; 303.
- [17] 荆学民. 重新省思政治传播的价值旨归.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19, 5: 2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Health Communication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Zhao Jie, Jing Xuemi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the public attributes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are maximized, thus intertwining with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e intertwinement of the two presents two forms in real life. One is to leverage each other to achieve a good communication effect. This include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support for the authority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the expansion of channels; it also refers to the situation where health communication provides communication materials fo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help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with its professionalism. The other is a one-way constraint, affec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ir respective performance. This includes situations wher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squeezes the space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sends wrong health messages; and health communication disrupts the normal order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From the root cause, the "administrative logic" followed by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and the "propaganda logic" followed by social-oriente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re the key factors that determin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Therefore, only by overcoming the chronic diseases of these two kinds of communication logic, mak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health communication organically linked in concept, taking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s the value orientation in a good system, and constantly improving the ability and quality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health communica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can the two truly achieve long-term and sustained positive interaction.

Key word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health communicatio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 收稿日期: 2021-01-11

■ 作者单位: 赵洁,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 北京 100024
荆学民,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

■ 责任编辑: 汪晓清